

贾平凹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整体观

韩鲁华 潘靖壬

【作者简介】韩鲁华、潘靖壬，商洛学院。

【原文出处】《小说评论》(西安)，2022.3.113~121

自1978年《满月儿》引起当代文坛的关注，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四十余年来，持续保持着旺盛的艺术创造生命力，特别是《废都》之后，几乎是每两三年一部长篇小说，令人叹为观止。也许是一种历史的宿命，自1978年5月23日的《文艺报》发表邹荻帆先生关于贾平凹文学创作评论的文章《生活之路——读贾平凹的短篇小说》，也特别是《废都》之后，有关贾平凹的研究与探讨，已然成为当代文学研究中作家研究上富有典型性的一个显学案例。当我们将贾平凹文学创作与研究进行历史性梳理后发现，不论是贾平凹的文学创作，还是贾平凹研究，与中国改革开放这四十年，产生着一种感应性的脉动或者律动，从中可以探寻到当代文学与研究的脉搏跳动与历史走向。

从当代文学研究来看，资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越来越受到当代文学研究学界的关注与重视，并且进行着成效卓著的实践，取得了累累硕果。学术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一种历史的沉淀，也是一种历史的总结与发现。在学术研究的发展历史中，沉淀了许多资料文献，到了一定的历史时期阶段，也就自然需要进行历史的归纳总结，从中会有着一些新的发现。而这其中，对于某种文学现象的研究资料进行收集整理，以期为后来的研究提供某种方便，也应当是其中一项不容忽视的研究工作。就对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整理而言，毫无疑问，贾平凹应当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对象。

一、关于贾平凹的文学创作

贾平凹以他四十多年写下的千万余字的文学创作实绩，似乎在昭示着：真正伟大的文学艺术家，都不是遵循乃至套用现有文学写作规则的，而是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创立着自己的文学写作规则的；他们不是被已有的文学史所能完全强行规约的，而是在

吸纳承续文学史上优秀成果的同时，延展并改写着文学史的发展。就现代文学而言，鲁迅们如此；就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而言，贾平凹、莫言们亦在做着这方面的探索、努力。

在这里，并非仅仅将贾平凹视为一位作家，而是将其称之为——一位中国的当代文学艺术家。之所以如此称谓，这是因为贾平凹不仅仅是在文学创作方面叱咤风云——小说、散文与诗歌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而且于书法、绘画、收藏等方面，亦有着“一超直入如来境”^①的不凡造诣。

关于贾平凹的书画等在此暂且不论，就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实绩来看，自1972年踏入大学校门，便在校刊上发表诗作《相片》，或者说自1973年在《群众艺术》发表革命故事《一双袜子》(有人将此作视为短篇小说，笔者以为不妥。该作虽有虚构的成分，但创作基本模式是按照当时革命故事模式而写作的。合作者是贾平凹大学同乡同学冯有源。)署名贾平凹以来，至2018年出版长篇小说《山本》，贾平凹以其富有艺术挑战性、探寻性的创作历程，建构起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文学景观。这种独特的文学景观的文学史意义，借用李星先生的话说，就是贾平凹作为一位“东方的作家，民族的作家，他是以自己的为传统文化所陶冶了灵与肉的精神与创作，与当代世界作着深层次的对话”，“用自己如椽之笔在为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命名”。笔者又想到陈晓明先生在一篇五万余言的长论中开头的话：“现代汉语白话文学历经百年的风吹雨打，终于成长几棵大树，贾平凹无疑傲然在列。不管从数量还是质量，不管是对当代现实的表现，还是对西北地域文化的表现，不管是他笔下众多鲜活灵动的人物，还是独具韵味的文字风格，贾平凹都无可争议是当代最卓越的作家之一。

历经三十多年的创作历程,他的创作涵盖了一部当代中国文学变革史,他笔力所及无疑是当代文学抵达的境地,他的困扰与艰难,无疑也是当代中国文学的困境。深入解读贾平凹的创作,细读他的作品,也是在解开中国当代文学的地形图。他身上显现出来的文学意蕴如此丰厚,汇集的问题、矛盾与启示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如果不认真对待贾平凹的创作,就不能脚踏在当代中国汉语言文学的坚实的土地上。”于此,我想用一种比喻的话语来描述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及其意义:贾平凹的文学创作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学史上一架富有高品质文学艺术矿藏的山脉。这架山脉通东西而会南北,有耸立入云的高峰,也有深邃幽静的山谷。这架山脉不是沉于海底或者谷底,而是存活于高原之上。贾平凹的文学创作,更多的不仅仅是借鉴或者吸纳,而是在做着一种会通。他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在致力拉通与中国古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经脉。

也许,这架山脉犹如秦岭一样。

这时,我想到张清华先生在一篇文章中的观点:从鲁迅到莫言构成了一个文学创作谱系。由此引发的话题是:中国新文学发展约有百年左右的历史,到了贾平凹、莫言这一代或者包括其后的作家,似乎在进行着一种历史性的总结与新的建构开拓。在阅读他们的作品,特别是他们有关创作的言论时,感觉到他们似乎都在强调:创立自己的文学艺术世界。实际上他们在致力于创建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自己本民族的文学世界。这与五四一代作家开创中国新文学这一脉是有所不同的,他们似乎更加自信,更加自觉地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与文学艺术的土壤,而不是完全或者更多地依赖于西方的文化与文学艺术资源的影响。

二、贾平凹研究

贾平凹的文学创作研究,已经构成了一个具有独特意义的文学研究现象。不仅研究论文数量大,而且涉及的面也非常广阔,体现出一种关于个体作家研究的水准与高度,其间所涉及到的问题应当说,也是当代文学研究中所遭遇的境遇之命题。就研究论文而言,仅以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的统计数据来说,截至2016年,以贾平凹为对象的

研究论文多达4465篇。其中期刊论文有3457篇(1980—2017年),博硕士毕业论文有424篇(2000—2016年),会议记录有50篇(1999—2016年),报纸概要有534篇(2000—2017年)。尤其是21世纪以来,其研究更是形成一种学术现象,诸如《文学评论》《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等学术期刊都曾以专题专辑形式刊登、发表贾平凹研究成果。如2012年第10期的《文艺争鸣》以“当代文学六十年·贾平凹研究专辑”为专栏,分别刊登了《黑氏》、《天狗》、《秦腔》的研究成果,2017年又以“贾平凹与中国当代文学”为题,一次刊发了16篇文章;2013年第3期的《当代作家评论》以“贾平凹专号”为专栏发表刊登《带灯》的研究成果,2015年第1期以“《老生》评论小辑”为专栏发表《老生》的研究成果;2013年第4期的《小说评论》以“贾平凹长篇小说《带灯》评论小辑”为专栏刊登《带灯》的研究成果、2015年第2期以“专题评论”为专栏刊登《老生》的研究成果;2015年第1期的《文学评论》已专栏刊登贾平凹《怀念狼》《老生》及贾平凹小说话语结构、有关西安的书写研究成果。还有如《扬子江评论》《东吴学术》《江淮论坛》等重要期刊也以专栏形式刊登发表贾平凹作品研究成果。因此,有关贾平凹的研究已成为当代文学研究评论中的“显学”,而贾平凹的文学建构自新世纪以来,始终与当代文学研究评论共构同振,丰富、发展着中国当代文学的书写经验与文学创作研究经验。或者说,从1978年邹荻帆先生在《文艺报》第5期发表《生活之路——读贾平凹的短篇小说》至今,贾平凹的文学创作研究已经构成了一种作家个案研究史。而从这个作家个案研究史中,在某种程度上说,亦是显现着中国四十多年来的文学研究历史的脉象。

从历史纵向来看,贾平凹文学研究确实有一个肇始、发展、丰富深化的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进程,大都可分为初期、中期和近期这么三个时段。三个时段区分,是以《废都》研究与《秦腔》研究为区划节点的。

初期的研究,就对于文学体裁的关注而言,主要集中在散文与中短篇小说上,诗歌研究也有,但很少。这也是与贾平凹的文学创作情景相契合的。贾平凹前期文学创作,致力于散文与短篇、中篇小说上,这也正是他们那一代作家在文学创作由散文、短

篇小说而中篇、而长篇的发展路数。进入九十年代,更确切地说,自《废都》之后,贾平凹长篇小说创作,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焦点。除极少的两部长篇之外,贾平凹每出版一部长篇小说,都有一批研究文章问世,而且直至今日,对于像《废都》等长篇的研究成果仍然不断出现。有十几部长篇小说研究,都可以单独编选一部研究的论文集子。这时,对于贾平凹文学创作整体性的研究著作与论文,也逐渐地多了起来。并且,贾平凹的文学创作,也成为硕士、博士论文选题的对象。进入新世纪,尤其是《秦腔》出版并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长篇小说研究、整体研究与比较研究、传播影响研究,构成了贾平凹研究上的几个重要理论视域。当然,在这四十年间,贾平凹的散文研究成果不如小说研究成果丰富,但始终延续着。而且他的书法绘画艺术,也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这方面的研究虽然并不是很多,但是,书法绘画乃至收藏等方面的研究,尤其是文学与书画艺术的互动研究,拓展着贾平凹研究的理论视野与维度,已然构成贾平凹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从形成研究的关注焦点来看,初期研究中,对于《商州三录》笔记体散文与短中篇小说《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古堡》等的研究探讨,不仅成为贾平凹研究甚至可以说成为当代文学研究上的一个重要的现象。也正是此时的研究,从学理上定性了贾平凹商州文学地理版图,以致于谈到贾平凹的文学创作,人们就自然而然地与商州内在地连接在一起。这一方面,陈思和等学者的研究是具有先导影响性的。不仅如此,当人们将研究的目光投向贾平凹的文学创作时,也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与当时当代文学创作连接在一起,比如与寻根文学等内在关联性,直到新世纪仍然成为一个回顾式研究探讨的话题。《废都》之后的研究,乡村——城市、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主流文化与民间文化等,成为研究者切入的重要视角。这也构成了贾平凹研究中期的两翼。毫无疑问,在九十年代贾平凹研究上,《废都》不仅构成了贾平凹研究上的一个焦点热点,也成为当代文学研究上的一个热点焦点。可以说,由《废都》所引发的研究话题,已经

超越了《废都》本身,将思想与文学理论触角,伸向了整个当代社会时代与文化领域诸多方面。比如它与重建人文精神的话题,与进入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等,就密切地关联在一起。进入新世纪,特别是《秦腔》之后,似乎又凝聚起贾平凹研究的热度。自此,贾平凹研究进入到一种热度持续的恒常状态。贾平凹的文学创作,自《废都》之后,将主要精力放在了长篇小说上,因而有关他的长篇小说研究,也就成为有关他的研究的半壁江山。在这里还应提到,随着《废都》的再版,对于这部作品做了一次重评性的历史性的归结。与此同时,有关贾平凹文学创作的译介、传播、影响研究,也赫然形成态势,构成了贾平凹研究上一股后起力量,越来越引人注目。这一方面的研究,似乎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等有着密切的关联性。于此,我们不去辨析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这一命题所引发的种种问题乃至质疑,我们只是从贾平凹研究现实出发,看到了其研究与外国尤其是西方国家汉学家越来越重视中国文学自然也包括当代文学这一现象的内在关联性。

不论就贾平凹的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研究,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这四十多年的发展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它们之间产生着一种共振。就其研究而言,更多的是与当代中国的文化思想发展与建设,似乎形成了一种互动式的关联建构。在研究的初期,中国改革开放思想大解放,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理想的追求建构,各种思潮蜂拥而至,但是社会历史文学批评依然是整个文学批评上的主流,因而,对于贾平凹文学创作的研究,也自然是以社会历史文学批评为其主调。后来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乃至各种各样的文化思潮与文学美学理论蜂拥而至,对于贾平凹研究的文化思想与文学美学理论视域,也在不断地拓展。在这中间,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文化思想视域,那就是中国的现代性的历史建构。不论是引进吸纳西方的东西,还是继承坚守本民族的东西,其目的还是要使得中华民族复兴或者振兴,建构起中华民族现代文化思想精神来。这也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有的研究者将贾平凹归之于传统,将其视为最为民族化的文学叙事,而有的研究者则是更侧重于其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意识。

其实,贾平凹及其文学艺术创作本身就是复杂的、综合性的,也正因为如此,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视域切入,自然会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呈现出研究上的复杂性、综合性。

有关贾平凹的研究,初始似乎对其评价还相对比较一致,将其归之于淳朴、清新等,这从人们对于《满月儿》以及那些散文的高度评价就可以看出。但是,总体来看,对于贾平凹的研究评论,更长时间里伴随的是争议。1980年代初,对于《二月杏》《“厦屋婆”悼文》《沙地》等一批作品的研究探讨,就出现了肯定与否定不同的声音。此后,人们对《商州三录》《鸡窝洼的人家》,尤其是《腊月·正月》等适时表现农村改革现实生活的作品,虽然也有不同的观点,但总体看来还是给予了比较充分的肯定,争议性并不是那么的突出激烈。而进入九十年,从《废都》开始,对于贾平凹的文学创作,争议成为贾平凹研究评论上的一种恒常状态。而且,愈是争议,愈是引起研究者的热度。比如,进入新世纪,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几乎都召开过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学术研讨会,甚至有的作品还在多地召开学术研讨会议,伴随的是一批研究成果的出现。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贾平凹这里,在莫言等作家那里也是如此,这也构成了新世纪文学研究上一个现象。

关于贾平凹文学创作研究,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归纳总结。

第一,贾平凹文学创作整体研究。这一研究,不仅着眼于贾平凹文学创作整体特征,而且往往是将其创作置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背景之下加以论说的,从中可以看出贾平凹文学创作与当代文学历史建构的息息相关性。不过,早期研究文章主要是以评论家的主观感受、心理映照为主,多是以对贾平凹文学创作阶段的划分为始,厘清不同阶段的不同创作特色。近期的研究文章,则呈现出更加宏观和多元的研究视域,不仅拉通了贾平凹文学创作的时间关节,而且更为宏观深入地从批评史的角度来讨论批评与创作的互动关系,试图对贾平凹创作不断走向历史化和经典化的进程加以学理性的归纳探究。在这一背景意义下的研究中,需要重点提及的是陈晓明《穿过“废都”,带灯夜行——试论贾平凹的创作

历程》一文,梳理了贾平凹1980年至2013年的小说创作,勾勒出贾平凹三十多年来文学建构的风格、特色变化,肯定了贾平凹对当代中国“新汉语”写作的卓越、杰出贡献,对贾平凹的文学创作,给予具有文学史意义的评价判断。还有李遇春《“说话”与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文体美学——从〈废都〉到〈带灯〉》一文以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说话”体(“话体”)小说为视角,从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对传统小说的继承、化用为论点,分析了贾平凹自《废都》至《带灯》以来的所有长篇小说的文体美学特征,指出贾平凹对中国古代白话体小说的现代性转化及对中国传统“块茎结构”艺术的创造性转化,认为贾平凹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史传”与“诗骚”传统基础上富有卓见的创造了以意象支撑结构的日常生活叙事方式。对于贾平凹以意象为其艺术建构核心的论说,笔者之一在其《精神的映像——贾平凹文学创作论》以及系列论文中有着比较充分的论说,在此不再多说。

贾平凹文学创作的艺术风格、审美特征的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已深入到作家文学建构的潜在心理层次。早期这方面研究,如丁帆《谈贾平凹作品的描写艺术》一文,指出贾平凹对作品人物的塑造是抒情性的,表现出对新生活的向往、对美的追求,其人物具有“姿”“韵”兼备的美学特点;认为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具有诗美特质及生活美感复现的特点。王愚、肖云儒《生活美的追求——贾平凹创作漫评》一文对贾平凹早期文学创作的艺术风格进行细致、具体的探讨与挖掘,认为贾平凹创作的艺术特色在于着重表现社会变型期中普通百姓的生活美和深居乡土的乡民的心灵美,具有诗的意境。刘建军《贾平凹小说散论》一文,开篇指出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色在于汲取传统小说资源的同时具有强烈的表现欲望和浓重的主观色彩,渲染着诗的意境和情绪,是散文化的小说,认为贾平凹文学创作的艺术实质在于真实、动情的主观抒情性。韩鲁华《审美方式:观照、表现与叙述——贾平凹长篇小说风格论之一》一文,以历时性的描述、分析、研究方法对贾平凹小说的美学风格作出比较准确、精当的分析,认为贾平凹的小说创作追求的美学风格是一种清新优美、空灵飘逸的美的表现方式;论者从审美观照视觉、审美表现方式、

具体的叙述结构形式等角度详细阐释。

对作家具体作品的美学观念及其中突显出来的主体人格精神和文化意蕴追求进行微观、细致的研究探析;从整体上把握、宏观上研究的文章大多以文学史的发展为背景,开始出现了一批视角独特、观点新颖的研究、评论文章。对贾平凹文学创作的内在美学风格的观照与作家审美个性、审美心理的把握作出精准的判断,使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贾平凹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入,以致这种研究具有了当代文学普遍意义上的阐发。

第二,贾平凹文学创作的比较研究。这是指研究者将贾平凹的文学创作与东方文学中不同时代的不同作家作品进行比较论说,或者是将贾平凹的文学创作与西方文学中不同时代的不同作家作品进行比较探析。一般而言,贾平凹文学创作的比较研究大致可分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两类。

影响研究又可分为三类:

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资源对贾平凹文学创作的影响。如栾梅健《与天为徒——论贾平凹的文学观》一文较为全面地论述了贾平凹文学观的形成原因,认为传统文化资源中的“天道”、自然观是形成贾平凹文学观的基础;而客观的地理环境和主观的个体生理条件、个人气质特色、家庭背景等因素均参与、影响了贾平凹的小说创作。胡河清《贾平凹论》一文从道家文化思想观念对贾平凹小说创作的影响切入,着重分析了传统文化中的“阴阳”观。《周易》思想对贾平凹早期作品《古堡》《浮躁》《白朗》《废都》等创作的影响,认为贾平凹是中国当代作家群中对“阴阳”观(男女性别)的观照最得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熏染。张器友《贾平凹小说中的巫鬼文化现象》一文,从巫术、鬼神文化对贾平凹小说创作的影响切入,认为贾平凹的文学建构始终与巫术、鬼神等文化现象一并构成其民间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巫术、鬼神等文化现象的参与、渗透与贾平凹笔下“商州”世界的独特人文环境、自然景观并相影响着乡民真实、真切的生活经历和情感变化。樊星《民族精魂之光——汪曾祺、贾平凹比较论》一文,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资源对汪曾祺、贾平凹小说创作的影响切入,指出汪曾祺的小说世界中表露出的士大夫的幽

远、高渺境界在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认为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资源对汪曾祺、贾平凹二人在小说创作时的影响程度不同,但两位作家在复现“民族魂”、反观社会的多变性与复杂性上是相一致的,承续了中国文学另一种文脉,为当代文学的历史建构具有着特殊的意义。

二是西方文化、文学传统资源对贾平凹文学创作的影响研究。有关西方文化、文学传统资源对贾平凹文学创作的影响研究的文章是双向的,也就是说有的研究文章是从西方文化、文学传统资源对贾平凹文学创作的影响这一角度展开论述,而有的研究文章则是从贾平凹的文学创作这一角度来看西方社会对中国文化、文学的接受程度。新世纪以来,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在欧美、日本等国家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西方读者视角中的贾平凹》以及《欧洲人视野中的贾平凹》等文集中讨论了贾平凹的作品在欧美国家的传播。如韦建国、户思社《西方读者视角中的贾平凹》一文,认为贾平凹的主要作品在国外连获大奖、引起巨大反响的主要原因,是作品展现了人类文明发展史必经的特定阶段,真实地描绘了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复杂心态。姜智芹《欧洲人视野中的贾平凹》一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贾平凹作品在英语、法语世界的传播:一是国外的译介与影响;二是国外的研究;三是传播与接受的原因。吴少华《贾平凹作品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一文,重点介绍了贾平凹的小说在日的翻译和研究情况。上述研究、评介的文章是从贾平凹的文学创作这一角度,来看西方社会对中国文化、文学的接受程度。黄嗣《贾平凹与川端康成创作心态的相关比较》一文,从创作心态、气质、心理的角度,比较了贾平凹与川端康成在文学建构上的相似性。沈琳《试析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贾平凹创作的影响》一文,认为贾平凹继承了马尔克斯作品中的孤独感,指出商州农村的建构与拉美农村存在相似性。韩鲁华《特殊视域下特殊时代的人性叙写——〈古炉〉与〈铁皮鼓〉叙事艺术比较》一文,通过对贾平凹《古炉》与联邦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铁皮鼓》的文本梳理,可以指出中国当代文学本土化、民间化叙事的确立与世界文学整体叙事中的当代性建构有着某种相似性、关联性;认为两位作

家在文化差异的背景下,其自身不同的艺术个性,体现出了作家对具有相同背景的人类经历的不同叙事艺术的有情书写。

三是中国文学思想对贾平凹文学创作的影响。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如雷达的《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陈晓明的《废墟上的狂欢节——评〈废都〉及其他》,蒋正治、唐妹的《试论贾平凹对〈红楼梦〉之接受》等。雷达《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和陈晓明《废墟上的狂欢节——评〈废都〉及其他》,都指出《金瓶梅》《红楼梦》《西厢记》等世情小说对《废都》创作的影响。而李陀《中国文学中的文化意识和审美意识——序贾平凹著〈商州三录〉》和李振声《商州:贾平凹的小说世界》,共同指认出贾平凹“商州”系列小说的艺术特质带有明显的明清笔记体小说的印痕。王刚《论贾平凹小说创作的审美视角与话语建构》一文,指出作家身上具有明显的现代作家(如张爱玲、沈从文、孙犁、川端康成等)审美意识的影响痕迹。

关于贾平凹文学创作的平行影响研究,多以同一国别、同一民族的作家为比较对象,从对同一类型化的文本出发,分析其艺术风格、创作个性等方面的异同。有关作家之间地域文化差异性研究,如赵学勇《“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一文,认为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的建构是其审美理想的总体表征,而含蓄、朴素的文字风格、淡化人物的主观情绪及对意境的创造,是沈从文独特的审美追求;而构成贾平凹笔下“商州”的审美境界,是一种静达、高远、清朗的“世界”,其审美追求是对沈从文笔下营造出的古朴、旷达的“湘西世界”独特审美意蕴的发展与延续。李振声《贾平凹与李杭育:比较参证的话题》,从贾平凹小说创作对西部文化资源的承袭与李杭育小说创作对吴越文化资源的承袭进行比较论证,认为贾平凹、李杭育为繁荣、壮大地域文化书写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梁颖《自然地理分野与精神气候差异——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比较论之一》,从对西部作家的杰出代表路遥、陈忠实和贾平凹的创作进行比较,指出三位作家所处的不同自然地理环境对其创作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认为路遥的小说建构带有陕北高原中的

刚毅与悲凉的色彩,陈忠实的文学创作具有关中地区的厚重与朴实的因子,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则具有陕南地区中的灵秀与清奇的特色。李吟《莫言与贾平凹的原始故乡》,认为莫言的创作追求的是格外放纵的表露,由野向狂,追求狂气、雄风和邪劲,而贾平凹则是有所节制的吟唱,由野向雅、雅俗相得益彰。

第三,有关贾平凹文学创作研究,还体现为跟踪式研究的特点。而这一方面主要是对于贾平凹长篇创作跟踪研究,特别是《废都》尤其是《秦腔》之后,几乎每一部新的长篇作品问世,就会出现一批研究论文。相比较而言,对于《废都》《怀念狼》《秦腔》《古炉》《带灯》《老生》等的研究比较集中,特别是《废都》《秦腔》《古炉》《山本》等。毫无疑问,《废都》研究已经构成了当代文学研究上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案例。

关于《废都》这里多说几句。《废都》——这是当代中国文学,甚至当代社会,必然要重提的一个话题。因为不论是致力于当代中国的文学文本的探析,或者工于当代文学史的建构;是对当代文学给予充分的肯定,还是予以严厉的批评,都是难以绕过《废都》的,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如果不是这样,恐怕当代中国文学文本建构,就会留下一个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的空白;或者进行历史的叙述,也就会留下一个令人惋惜的缺憾。所以,你赞成也好,批评也罢,甚或是以枪炮似的批判,你都在阅读《废都》,都在审视《废都》。

这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存在的事实:现实的和历史的。

《废都》出版的1993年,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是一个极为具有历史意味的年份。进入90年代,“市场经济”是一个极具冲击力的名词,这个名词的完整表述应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的知识分子再一次经历了精神的蜕变:由无语而失语,甚至神经错乱地胡言乱语。知识分子的堕落,已成为有目共睹的社会事实。知识分子的堕落,表现为各式各样:或为金钱而进行的文学评论,或为某种项目而卑颜屈膝,或做了媒体或权力的奴才,凡此等等,均可视为精神堕落的表现。这些与庄之蝶相比,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1980年代,知识分子那种精英文化立场,在许多所谓的文人那里,已是荡然无存。

由此可见,走向精神堕落,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生存状态。虽然这个堕落过程可能是如此的痛苦,其间充满了困窘与无奈、尴尬与荒诞。《废都》,不合时宜地以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状态及其解构历程的文学叙事,为我们描绘了知识分子的精神映像。虽然已经掉入精神的泥潭,但是,阿Q似的忌讳与自尊,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拒绝《废都》为自己存照。于是,知识分子与他者进行合谋,撕碎着《废都》的存照。也许正因为如此,《废都》必然要有这一段生不逢时的历史命运。好在这段历史已经翻了过去。查阅1994年后报刊杂志,有关《废都》的研究评论文章,达数百篇之多。但这些文章,多为关于贾平凹文学创作整体论述,或者在对作家其它作品论述的过程中,间以《废都》的研究评论文字。随着时间的推移,单独研究《废都》的文章偶见于学术期刊。2000年之后,随着中国社会历史形态的转型,特别是知识分子在许多社会文化问题上的缺席,尤其是知识分子文化精神上的溃退,不由使人想到《废都》,对《废都》进行重新阅读与研究。这种研究最具意味的应当是:研究界对于这部作品评价上的历史转向。包括当年持严厉批评态度的文学批评精英,就有一些人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近几年来,研究《废都》的文章较前多了起来,对这部曾经引起诸多争议的作品,进行重新审视,对其文学艺术价值,进行重新评价,给人以更多的启发与思考,对于当代中国文学之发展与学术研究,有着更多的裨益。比如一组刊发于2010年第5期《小说评论》上孟繁华先生主持的《大时代与知识分子的心灵波澜——重评〈废都〉》专题评论文章。于此,我们不仅从这些评论文章中,读到了对于《废都》的重新评价,从中发微着对于这部作品价值新的解读与发现。更为重要的是,从这种评论行为中,我们更读到了一种文学批评和批评者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姿态。历史地看,今天对于《废都》的研究与评论,比起《废都》初版时要冷静的多、客观的多,也学理化多了。于此,我们更关心的是《废都》的文学艺术价值。在我们看来,从文学艺术价值角度来说,《废都》可以言说的东西还很多。虽不敢说《废都》是一部言说不尽的作品,但它确实是一部至今仍然有话可以言说的作品。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它

的生命力都会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民族,得以不断的言说。《废都》是不是一部伟大的作品,自有历史去做公断。所以,我们至今仍然坚信,《废都》是一部不可轻易下结论的书。

关于《废都》研究的再思考,也许陈晓明的观点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毋庸讳言,在贾平凹的创作历程中,《废都》是其重要的起轴心作用的作品,这不只是在于它曾经产生过激烈的社会影响,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标识着九十年代中国文学重新开始的独特的戏剧性形式。而贾平凹本人的创作抵达于此,本来是预示着他创作风格和小说美学观念的转变,遭遇历史化的戏剧性冲突,他本人也放弃了这一方位的转向,而转向更具有现实性的创作。贾平凹抵达这一“废都”不仅仅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他要写出20世纪九十年代之初,中国社会现实的困扰、虚空与茫然;同时具有深远的历史感——要在文化和美学上试图沟通古典时代的血脉。然而,他要穿越“废都”的方式却是选择了颓废美学,在这“废都”的旷野上,前有古人,后无来者,只有他只身一个去迎接降临的“古典美文”,谁能理解这样古怪的超前举动呢?九十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重新出场就遭遇到这一片废都,如此空无一人的历史空场,只有一个自以为旷达的贾平凹,他不幸就成为重拾批判性大旗的知识分子集体行动的牺牲品。两者本来相距甚远,不幸狭路相逢,历史将错就错,而贾平凹也只有将错就错。“废都”这一方天地,不再是他经营古典美学的理想家园,而是他要辞别的故土旧地。贾平凹转向《秦腔》,又有《古炉》,还有《带灯》,这就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废都》起到的轴心作用了。贾平凹没有在“废都”里被击垮,而是站立起来,重新出发,不断成就自己,有着一种更加沉静笃定的写作状态。这就可以去梳理贾平凹抵达《废都》的曲折过程,他转向走出了一条更加险峻的路径。这一路径,无疑也折射出当代中国文学的隐秘路径。

注释:

①陈传席:《“一超直入如来境”》,载贾平凹:《贾平凹语录》,山东友谊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